

转型与发展 第2辑

转型社会的 研究立场和方法

□ 主编/李友梅 孙立平 沈 原

- “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的两条途径…………… 沈 原
- 影展与社会介入：铁马影展的经验与反思…………… 李哲宇
- 发达影像时代的社会运动…………… 关晨引
- 公共社会学…………… 麦克·布洛维
- 什么是解放社会学？…………… 费 金、薇 拉
- 把社会还给社会主义…………… 埃里克·赖特
- 想象《社会学的想象力》…………… 约翰·布鲁尔
- 今天我们如何阅读社会理论…………… 刘 新
- 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 应 星
- 全球民族志…………… 吉 尔、奥瑞恩
- 韩国产业化时期女性工人的“日常生活”
——以家庭、国家、性别为中心…………… 金 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转型与发展 第2辑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No.2

转型社会的 研究立场和方法

□ 主编/李友梅 孙立平 沈 原
□ 主编助理/吕 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李友梅, 孙立平, 沈原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

(转型与发展 第2辑)

ISBN 978 - 7 - 5097 - 0668 - 8

I. 转... II. ①李... ②孙... ③沈... III. 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6687 号

转型与发展 (第2辑)

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

主 编 / 李友梅 孙立平 沈 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高 崇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1

字 数 / 351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668 - 8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高校社会学 E-研究院重点规划项目

国家重点学科（社会学）重点规划项目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编者的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转型与发展》第2辑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在这一辑中，我们选择了“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作为主题，试图就“面对这一大转变的时代，如何提出好的社会学真问题”勾勒出一幅初步的图景。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主题，乃是基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学状况的总体判断和焦虑。时至今日，“转型”一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是，如何面对转型社会，如何探讨转型问题，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却还远远不是一个已达到高度自觉、形成集体共识的事业。我们认为，就研究立场和方法而言，中国社会学已经陷入一系列深刻的悖论之中：第一，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社会学本来应当具有一种穿透时空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对我们这个时代那些“重大而要命”的“真问题”做出反应，然而有的人却因遭遇“后现代”，接受了强调“微小实践”和“碎片化”的社会学思维方式而丧失了这种能力和使命感，学术界生产的知识越来越和现实生活脱节和无关；第二，在理论和技术方面，本来中国社会学应当发展出有能力把握剧烈社会变动的理论和方法，但却接受了最适合于测量稳定社会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并且逐步将之奉为主流而忽略了发展其他的方法。这就窒息了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造成了它的“错位”。于是，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而无动于衷。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变成了如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social magic）：它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民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任何新的知识。

我们选择沈原的《“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的两条途径》

一文作为开篇，正是为了对上述的悖论做出回应。这篇纲领性的文章表达了我们的一个共同立场，那就是我们的研究，要从社会生活实践的角度出发，力图将社会改造的面向与社会认知的面向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我们还刊发了李洁撰写的《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一文，从而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李哲宇和关晨引分别撰写的文章，则从他们自己参与策划的“铁马影展”出发，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一种社会介入方式的影展”从拍摄到流通，各个环节所引发的社会效应，藉以探讨运用纪录影像来从事社会介入行动的可能与局限。同时，作者还反思了反抗性影像作为文化再现所散布的政治力量，以及纪录影像的真实、美学和技术。联想到在大陆正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新纪录片运动”，大陆的社会学家真的很有必要反思自己：社会学知识如何介入公共生活？

实际上，不仅仅是在转型中的中国，在西方，许多社会学家也面临同样的困惑。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社会学越来越将自己束缚在学院的高墙之内，而离公众的生活和人类的命运越来越远。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所提出的“公共社会学”，代表了西方学者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反思，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学术杂志都发表了评论文章甚至专题[例如，《英国社会学季刊》(*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5 年 Vol. 56, Issue 3]。本辑刊发了《公共社会学》一文的部分章节。在 2007 年的访华演讲中，布洛维更是将公共社会学与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市场化浪潮”联系起来，呼吁“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 为了捍卫人的权利而共同斗争。这也正是近些年来布洛维致力于推动“全球民族志”的动力所在。本辑刊发的《全球民族志》一文，为我们理解这项主张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概括。

同样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费金（他的任期是 2002 ~ 2003 年，布洛维则是 2003 ~ 2004 年），则和堪萨斯大学社会学系的薇拉教授一道，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让社会学介入公共生活的视野。在《什么是解放社会学？》中，读者将感受到一种鲜明的研究立场，并将同时看到各种体制对社会学家的“收编”给社会学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立志改变这一现状的社会学家们，为重新恢复“解放社会学”的传统而付出的努力。

米尔斯正是“解放社会学”传统中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也为每个社会学的从业者所津津乐道。然而，今日的人们已经很少注

意到这一词语诞生时的背景，以及米尔斯本人作为一名“有良心的工匠”在当时的艰难处境。布鲁尔的《想象〈社会学的想象力〉》一文，尽管立论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它从个人生平传记的角度出发，为我们理解米尔斯本人及其《社会学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也许不无想象力的维度。

此外，本辑还刊发了赖特撰写的《把社会还给社会主义》一文。赖特在2007年暑假造访中国时，曾以本文的主要内容为纲，以“指南针：发展的选择和转型模式”为题做过专题演说。我们虽然并不赞同其所有观点，但毫无疑问，作者的许多真知灼见会给我们在一个转型时代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带来启迪。

应星的《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可以被看做是对孙立平教授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的一次深化和反思。实际上，从“过程—事件”分析到“实践社会学”，一直到最近郭于华教授提出“社会学的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一直有一批学者在对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做着不懈的反思，而这条道路显然还将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变化继续下去。

除了上述与“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这一“主题研讨”有关的文章之外，本辑在“学术论文”栏目中还刊发了三篇文章。

韩国学者金元的《韩国产业化时期女性工人的日常生活》一文，所针对的问题是韩国产业工人研究中存在的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观点——或者把工人看做是被动的顺从者，或者把他们看做是奋起反抗的阶级。作者认为这样是把工人单一化了。于是作者选取了复杂的女工和她们尤为多样纷繁的日常生活来透视产业工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她们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女工们的反抗并不意味着她们超越了或者企图超越国家主义的意识，而女工们的顺从也不意味着她们对家庭伦理、男女等级的绝对认同，她们不过是要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求得卑微生存和坚强自立的“女人”。可以说作者选取的视角和我们在本辑中强调的立场和方法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文中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分析，对正在经历产业化的中国读者来说，会有很多熟悉的地方。

乡镇研究曾经是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衰落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三要政府”（要钱、要粮、要命）的乡镇也开始被视为多余。在这种情况下，乡镇研究也逐渐呈颓势。邢幼田的《乡镇政府权力经纪与土地产权操弄》一文给

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该文以乡镇政府近二十年来的土地开发为研究对象，抓住产权作为核心议题，企图重新发掘乡镇研究的理论潜力。该文将经验研究和理论抱负相结合，既具备历史感，又有社会研究的力道，作者提出“土地位于当代中国大转变的核心”的重要命题，更是值得深思。

刘玉照的《市场转型理论的再思考》，用实证的方法，为孙立平教授所提出的“再分配与市场的双重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的观点提供了注脚。传统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具有一种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再分配制造不平等，市场则起一种抵消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权力和市场两种经济整合机制，但其作用的方向是相反的，占支配地位的机制造就不平等而第二位的机制缓和不等。该文事实上验证了一种新的解释：市场和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的。而这也许正是中国经济转型最具有独特性的特征之一。

二〇〇七年七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主题研讨

“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的两条途径	沈 原 / 1
------------------------------	---------

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

——阿兰·图海纳社会学思想的初步介绍	李 洁 / 26
--------------------------	----------

影展与社会介入：铁马影展的经验与反思	李哲宇 / 41
--------------------------	----------

发达影像时代的社会运动

——从《贡寮，你好吗？》的经验思考纪录影像的

社会介入	关晨引 / 63
------------	----------

公共社会学	麦克·布洛维 / 85
-------------	-------------

什么是解放社会学？	费 金 薇 拉 / 102
-----------------	---------------

把社会还给社会主义	埃里克·赖特 / 136
-----------------	--------------

想象《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个社会学经典的传记背景	约翰·布鲁尔 / 183
----------------------	--------------

今天我们如何阅读社会理论	刘 新 / 203
--------------------	-----------

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	应 星 / 216
---------------------------	-----------

全球民族志	吉 尔 奥瑞恩 / 226
-------------	---------------

学术论文

乡镇政府权力经纪与土地产权操弄	邢幼田 / 254
市场转型理论的再思考	刘玉照 / 271
韩国产业化时期女性工人的“日常生活” ——以家庭、国家、性别为中心	金元 / 292
稿约	/ 325

“强干预”与“弱干预”： 社会学干预的两条途径

沈 原*

一 转型社会、转型问题与转型社会学

（一）“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早已为人所共知。近 30 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解决了以往在“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体制下难以解决的众多经济问题，使得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升。短短的 30 年，中国社会就从一个科尔内（J. Kornai）笔下的“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体制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人们将此种经济增长称为“经济奇迹”并不过分。但导致这个“经济奇迹”的“体制奇迹”，迄今为止却未必为人所深切体察：30 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几乎没有任何根本改变。由此造就了这样一个奇特境遇：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与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并存共生、互为促进。两者的这种密切结合，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从未出现过。由此出发，奠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之上的整个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似乎都受到了某种动摇并面临挑战。

（二）“社会的生产”作为独特的转型问题

“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的并存共生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

*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本文的一个简写本，刊登于《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5 期。

基本特点,使得中国社会呈现不同于东欧、中欧和俄罗斯等其他转型社会的某些特征。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奇迹”却带来了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社会后果:人们原本以为市场经济会自然而然带来的那些社会范畴,如自由、民主、平等、民权等,竟然连一个都没有实现。相反,它们全都变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中国的转型社会虽然身处现当代的时空条件下,但生发出来的竟然是最古典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的生产”问题,即所谓“公民之间自组织的社会联系”究竟能否产生?如果能够产生,又会从何而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的“转型问题”。虽说面对这个问题,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些历史教科书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但这并非意味着就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理论线索。实际上,按照“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的理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就是波兰尼(K. Polanyi)意义上与“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相对立的“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以及葛兰西(A. Gramsci)意义上与“国家”相对立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Burawoy, 2003)。所以,我们面对的转型问题可以被具体化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开放经济+封闭政体”的条件下,这种“能动社会”或“公民社会”,或者更为全面地说,一种同时具备“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诸特征的社会,究竟如何被生产出来?^①

(三) 转型社会与转型社会学的使命

时至今日,未必有人再来质疑“转型社会”的提法了,虽然就在差不多五年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某些人还对“转型社会”的提法抱持强烈怀疑态度。但是,如何面对转型社会,如何探讨转型问题,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却还远远不是一个已达到高度自觉、形成集体共识的事业。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经历了长达差不多30年的“冷冻期”之后,它是在美国社会学的帮助下逐渐复苏的。美国社会学提供的理

^① 这里所说的“社会的生产”,与图海纳(A. Touraine)等人提出的“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 of Society),具有不同的意义。图海纳等所谓“社会的生产”,面对的是西方社会,在历经世界大战、法西斯暴政等众多劫难之后,究竟是如何维持和再生产出来的;而作为“转型问题”的“社会的生产”,是指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机制在受到长期压抑后,在仍然欠缺某些基本前提的条件下,是否能够被再生产出来。

论和方法的训练，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一代社会学家，使他们能够着手从事最基本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工作。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由此而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之中。这一悖论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问题意识”的生产而言，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社会学本来应当具有把握社会制度和阶级再形成的宏观眼光，培育生产宏大话语的能力，但却因遭遇“后现代”，接受了强调“微小实践”和“碎片化”的社会学思维方式而丧失了这种能力；第二，在理论和技术方面，本来应当发展有能力把握剧烈社会变动的理论和方法，但却接受了最适合于测量稳定社会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并且逐步将之奉为主流而忽略了发展其他的方法。这就窒息了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造成了它的“错位”。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对之加以研究和测量。所以，现实情况竟是这样：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因强调“价值中立”而无动于衷。实际上，近两年来社会学开展的某些大规模社会调查，就体现出上述特点。^① 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变成了如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social magic）那一类的手艺：它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民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Bourdieu, 1999）。

毫无疑问，社会学跳出上述“学术巫术”陷阱的一条途径，就是重新定位，面对转型社会，寻找适合探索转型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和方法或许与观测稳定社会的理论与方法大相径庭。

二 “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

（一）从“结构社会学”走向“行动社会学”

如柯尔库夫（P. Corcuff）所说，社会学总是在一系列“成对概念”（paired concepts）的争论中进展的（柯尔库夫，2000：1）。“社会行动”

^① 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2003年社会学界所做的一项关于“农民幸福感”的问卷调查。那个调查的结果公布后，曾经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持久的争论。

和“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学中一对经常被使用的，但却带有强烈争议性的“成对概念”（唐有财，2005）。自古典时期以降，社会学家们总是沿着将这对概念处理成“二律背反”的道路前进。大多数社会学家强调“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作用。从“社会结构”出发来处理人们的“社会行动”，突出结构模式、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等对“社会行动”的支配作用，是这些社会学家处理“结构与行动”关系的基本思路。这条思路构成社会学的主流看法。时至今日，沿着这条思路进展的，在宏观理论层面有各式各样的“结构主义”和新老“制度主义”，在微观理论层面则有以“社会网分析”为核心的“结构社会学”（White, 1981; Granovetter, 1985）。与此同时，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强调社会行动的主导作用，并且试图在此前提下沟通“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例如，沿着韦伯传统前进的社会学家，多半会强调“社会行动”的作用）。最后，按照柯尔库夫的说法，当代一些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如布迪厄等人，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在于试图借助“建构主义的提问方式”来超越“行动与结构”的二律背反，达成新的理论综合（柯尔库夫，2000）。

我在这里提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这对概念，并非旨在单纯从理论上探索两者的关系，而是力图从社会生活实践的角度出发，突出“行动社会学”（Sociology of Action）及其特有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转型社会的意义。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时而突出“结构”，时而突出“行动”，似乎并非纯粹的理论偏好使然。一般说来，在社会框架稳定时期，社会学家努力发掘的多是“结构”对“行动”的支配和制约作用：看到貌似自由的行动背后，存在着隐秘的、深层的结构支配机制，发现制度和规范如何经由各种途径而被“内化”为人的行为动机。“制度是如何思维的”已将这条思路的基本特点一语道破（Douglas, 1986）。但是，至少在两种情况下，社会学家会转而强调“行动”的作用：第一，即使在社会框架基本稳定时期，当出现社会运动时，社会学家会强调“行动”的作用；第二，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力求改变基本的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也不可能像其在稳定时期那样规范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时，社会学家更多看到的是“行动”的意义和作用。

因此，当我们发现运用某些主流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无法面对转型社会和转型问题，而且还会使社会学承担着变形为“社会巫术”的巨大风险时，我们就不得不转移我们的方向，实现从所谓“结构社会学”向

“行动社会学”的转变，力求从行动的视角，从行动者的主体性的视角，来考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二）“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方法

论及“行动社会学”，特别是欧陆传统的“行动社会学”，首推阿兰·图海纳的理论和方法。诚然，图海纳提出“行动社会学”，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目标直指所谓西方后工业主义的“程序社会”（programmed society），在理论上则是针对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并且在这种批判中彰显行动者的主体性：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针对布迪厄的“结构再生产理论”（McDonald, 2002）。如丢比和韦维尔卡所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图海纳业已撰写了超过一打的著作，涉及劳工、社会运动、依附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四个领域，并且开始思考为在《行动社会学》（*Sociologie de l' action*, 1965）和《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 de la societe*, 1973）中形成的“行动社会学”体系寻找一套特有的研究方法，即“社会学干预”（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方法（Dubet and Wieviorka, 1996）。显然，系统地论说图海纳的整个理论和方法并不是本文的任务。借助英文来阅读图海纳著作也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我在这里只是挑选出我认为对“转型社会学”建设最有意义的三个观点，加以简单提示。这三个观点全都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

第一个观点是对“社会”的不同理解。与帕森斯主义将“社会”理解成一系列规则、技术、功能和适应环境的反应方式不同，图海纳要求实现“从社会到社会行动”的过渡，并且把“社会行动”理解为“社会自身的某种历史质”（historicity）的体现。按照图海纳的界定：“‘历史质’即社会根据其文化模式，并且经由冲突和社会运动来构建其自身实践的能力。”图海纳由此恢复了曾经被结构主义消解为无的历史主体（historical agency）的概念和意义（Touraine, 1988: 3）。

第二个观点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不同理解。按照图海纳的观点，社会学家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外在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但是，如丢比和韦维尔卡所说，这种特殊的社会研

究方法,即“‘社会学干预’方法,并不仅仅是一套收集数据的技术……不能与其理论基础分开……因为它是由关于社会行动、社会和社会学家的角色等一系列概念所保证的”(Dubet and Wiewiorka, 1996: 55)。图海纳认定: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并非轻易可见,它们确实被秩序和支配掩饰起来。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就是使这些关系显现,从而不再受到各种社会惯例范畴的摆弄。因此,这就预设了社会学家的积极干预(Touraine, 1981: 139)。

通过积极的社会学干预,拨开覆盖在社会关系上的支配和习俗,通过设法重建行动者所处的社会情景,向行动者以及研究者展示这些关系的本相和实质,这就是社会学干预的意义所在。此外,图海纳还为社会学干预设定了四个基本原则,即①与社会运动本身建立面对面的直接接触;②超越意识形态话语;③将运动置放在一个情景中,通过与运动双方对话,突显所争夺的社会和文化目标(cultural stake);以及④研究者的两种功能:激励者和秘书,其将对行动者的观察转化为社会行动理论范畴,以增强行动者的能力(Touraine, 1981: 143-145)。此外,图海纳设计了社会学干预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和技术手段(Touraine, 1981, 1988)。

第三个观点是对“社会学知识”的不同理解。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理论,以及“行动社会学”特有的方法即“社会学干预”,彻底改变了社会学知识的性质。生产社会学的知识从此不再是社会学家的专利。社会学知识是在社会学家和行动者的互动中生产出来的,是两者共同的产品。

图海纳发展出“行动社会学”及“社会学干预”,本意是探讨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运动。但毫无疑问,对他的基本思路加以适当调适,就应能够运用于研究中国的转型社会。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据主要有两条:第一,如前所述,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而社会转型期意味着各种社会行动者透过自己的能动行动,改变社会的制度安排,重建基本的生活秩序。在这样的历史时段,行动者作为历史主体的巨大能动性得到充分展示。对于这种能动性,只有从“行动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才能加以深刻体察和把握。第二,如有论者早已指出的,在中国社会,“社会调查是一种权力”(方慧容, 2001)。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国家已将社会调查建构成一种针对全社会的“治理技术”。国家的权力借助此种社会调查技术而深刻地浸透于整个社会之中。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

即使社会学家刻意坚持“工具实证主义”的立场，运用基于“客观主义原则”而发展起来的各种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行动者那里也难以收集到客观、真切的信息，因为行动者根本区分不开社会学家的调查与国家权力的运作究竟有什么区别，从而会努力将自己的真实生活掩饰起来。换言之，要想真正地把握行动者的生活世界，社会学家就必须另辟蹊径。或许社会学干预就是获得真实有效数据的途径之一。

（三）“强干预”与“弱干预”：对社会学干预方法的若干修正

当然，论及“社会学干预”的社会学家绝不止图海纳及其学派。例如，当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在论说“扩展个案法”时就专门讨论过他所理解的“社会学干预”（Burawoy, 1998）。但无论如何，图海纳的确最为系统地阐释了“行动社会学”及“社会学干预”方法，因此不能不将图海纳及其学派当作“行动社会学”及“社会学干预”的主要代表。不过，说“行动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学干预”方法适用于研究中国转型社会，当然不能原封不动地套用。理论和方法都必须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加以修正，使之调适于实际生活。实际上，图海纳及其学派所提供的只是一条基本思路，虽然是一条最重要的思路。根据我们的探索，对图海纳版本的“社会学干预”方法，还应当加以若干修正，才能使之面对中国转型社会的实际状况。我认为这些修正至少包括如下三项。

首先是借助于“解放社会学”（Liberation Sociology），直言不讳地引入研究者的立场。图海纳毕竟是一个出身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学者，虽说他面对日渐僵死的资本主义“程序社会”与欠缺活力的主流社会学，提出了不同凡响的“社会学干预”，但正如恩格斯对歌德和黑格尔批判的那样：他们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却都仍然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图海纳也不例外。强调“社会学干预”的学术正当性是图海纳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主张的是一种没有立场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还不如布迪厄。晚年布迪厄明确提出：面对社会大众的苦难，社会学如若不希望变成“社会巫术”，那就必须深入社会生活，传达底层的声音（Bourdieu, 1999）。图海纳似乎就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立场。但是，在底层社会饱受压迫的“程序社会”和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安排中，无立场就是抱持某种立场，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因此，对图海纳版本的“社会学干预”的第一个改造，就是借助于“解放社会学”，明确地设定社会学家